

21世纪年度散文选

2009

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9 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9

(21 世纪年度散文选)

ISBN 978-7-02-007744-1

I. 2… II. 人…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9402 号

责任编辑:杜丽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李博

2009 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85 千字 开本 88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744-1

定价 2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我社自一九八〇年起,曾经编选和出版过《1980—1984年散文选》、《1985—1987年散文选》、《1988—1990年散文选》和《1991—1993年散文选》,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一九九四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进入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了及时总结年度散文创作的实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散文作品,进而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我社决定恢复年度散文的编选和出版工作。

恢复出版的散文年选总冠名为“21世纪年度散文选”,每年编选一册。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入选篇目以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此项工作得到了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提出了很好的编选意见,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不仅能了解本年度散文创作的总体概貌,而且能集中欣赏和阅读这一年里出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真诚地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目 录

放下与执着 .....	史铁生	1
重峦叠嶂的田园 .....	余秋雨	6
北大记忆之二:天堂之门 .....	曹文轩	17
漫长的假期 .....	韩少功	23
兄弟之间 .....	马新朝	32
啊,宛川(节选) .....	陆承	38
站在蝉的角度思考 .....	吴安臣	47
逝水随风 .....	五月	51
教孩子们伟大的诗(外二章) .....	庞培	57
甘南行吟 .....	吴明阳	63
多瑙河的蓝色旋律 .....	熊育群	69
别在金矿上种卷心菜 .....	于丹	77
湘西年味 .....	彭学明	81
萝卜在歌唱(外一章) .....	吴孔文	97
草原夜色 .....	贾文清	101
我的外婆 .....	希子因	108
母性·女性 .....	瑞兰	121
梦开始的地方 .....	筱筠	125

天山南北 .....	李颖超	134
木镇的事物 .....	耿立	148
跨越喜马拉雅的旅行 .....	朱效文	159
染教世界都香 .....	王丽文	165
生死两西湖 .....	李元洛	172
在水边 .....	韩开春	182
心灵深处的回声 .....	葛水平	197
甘泉宫游考 .....	阿莹	213
漫读天书 .....	季红真	221
我在埃及拜谒法老 .....	雷达	233
旧物上的时光(外二章) .....	嘎玛丹增	241
花开的三月 .....	庞华坚	253
融入自然 守护大地		
——苇岸十周年祭 .....	谭五昌	264
乡村保姆们走进城市人家 .....	夏坚德	266
天路:翅膀掠过的滇西雄关 .....	陈洪金	283
纪念何满子先生 .....	林贤治	290
春秋之书(节选) .....	无益	298
早年的那截子城墙(外三章) .....	周军成	317
滇绿 .....	刘增人	331
关于亚洲的想象、颂歌或练习曲 .....	牟森	336
走失的亲情 .....	冯浩	354
对一座桥的凭吊(外一章) .....	李登建	367
老舍着装的历史内涵与精神表征 .....	徐德明	379
读爱,在花开的春天 .....	项丽敏	386
季羨林与吴宓 .....	王泉根	395
我的爸爸季羨林 .....	季承	399
我的父亲梁实秋 .....	梁文蔷	403

读书新语 .....	侯德云	410
八十年代一首诗 .....	程宝林	419
隔岸的花树 .....	朱以撒	429
两本旧书 .....	周同宾	437
剪影重庆 .....	刘 熹	442
蟋蟀·鸟还有季节 .....	张 毅	450
黑夜方程式(外一章) .....	傅 菲	462
美得惊动了家长 .....	熊培云	477
你会给乞丐钱吗 .....	曾 颖	480
母亲的遗物 .....	王兆胜	483
口味 .....	黄 裳	490
冯亦代之悔		
——读冯亦代《悔余日录》 .....	朱 正	498

## 放下与执着

史铁生

几位老友，不常见面，见了面总劝我“放下”。放下什么呢？没说，断续劝我：“把一切都放下，人就不会生病。”我发现我有点儿狡猾了，明知那句佛家经常的教诲（比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也不专指索命的器具，是说一切执迷），却佯装不知。佯装不知，是因为我心里着实有些不快；可见嗔心确凿，是要放下的。何致不快呢？从那劝导中我听出了一个逆推理：你所以多病，就因为你没放下。逆推理中又含了一条暗示：我为什么身体好呢？全都放下了。

既知嗔心确在，就别较劲儿。坐下，喝茶，说点儿别的。可谁料，一晚上，主张放下的几位却始终没放下几十年前的“文革”旧怨，那时谁把谁怎样了吧，谁和谁是一派的吧，谁表面如何其实不然呀，等等。就不说这“谁”字具体是指谁了吧，总归不是“他”或“他们”，就是“我们”。

所以，放下什么才是真问题。比如说：放下烦恼，也放下责任吗？放下怨恨，也放下爱愿吗？放下差别心，难道连美丑、善恶都不要分？放下一切，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总不会指着什么都潇洒地说一声“放下”，就算有了佛性吧？当然，万事都不



往心里去可以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但人间的事绝不可以是这样,也从来没这样过。举几个例子吧:是执着于教育的人教会了你读书,包括读经。是执着于种田的人保障着众生的温饱,你才有余力说“放下”。唯因有了执着于交通事业的人,老友们才得聚来一处喝茶。若无各门各类的执着者,咱这会儿还在钻木取火呢,还是连钻木取火也已经放下?

错的不是执着,是执迷,有些谈佛论道的书中将这两个词混用,窃以为十分不妥。“执迷”的意思,差不多是指异化、僵化、故步自封、知错不改。何致如此呢?无非“名利”二字。但谋生,从而谋利,只要合法,就不是迷途。名却厉害。温饱甚至富足之后,价值感,常把人弄得颠倒不知所归,其实也是在谋名了。价值感错了吗?人要活得有价值,不对吗?问题是,在这个一切都可以卖的时代,价值的解释权通常是属于价格的;价值感自也是亦步亦趋。

价值和价格的差距本属正当。但这差距却无从固定,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当然这并非坏事,这正是经济学所赞美的那只市场的无形之手。可这只手,一旦显形为铺天盖地的广告,一旦与认钱不认货的媒体相得益彰,事情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只要广告深入人心,东西好坏倒不要紧了,好也未必就卖得好,不好也未必就卖不好。媒体和广告沆瀣一气,大约是经济学未及引入的一个——几乎没有底线的——参数。是呀,倘若那无形或有形的手也成了商品,又靠谁来调节它呢?价格既已不认价值这门亲,价值感孤苦无靠去拜倒在价格门下,也就不是什么难解的题。而这逻辑,一旦以“更高、更快、更强”的气势,超越经济,走进社会各个领域,耳边常闻的关键词就只有利润、码洋、票房和收视率了。另有四个词在悄声附和:房子、车子、股市、化疗。此即执迷。

而“执着”与“执迷”不分,本身就是迷途。这世界上有爱

财的,有恋权的,有图名的,有什么都不为单是争强好胜的。人们常管这叫欲壑难填,叫执迷不悟,都是贬义。但爱财的也有比尔·盖茨,他既能聚财也能理财,更懂得财为何用,不好吗?恋权的嘛,也有毛遂自荐的敢于担当,也有种种“举贤不避亲”的言与行,不对吗?图名的呢?雷锋,雷锋及一切好人!他们不图名?谁愿意说他们没干好事,不是好人?不过是不图虚名、假名。争强好胜也未必就不对,阿姆斯特朗怎么样,那个身患癌症还六次夺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人?对这些人,大家怎么说?会说他执迷?会请他放下?当然不,相反人们会赞美他们的执着——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矢志不渝,都是褒奖。

主张“一切都放下”,或“执着”与“执迷”分不清,是否正应了佛家的另一个关键词——“无明”呢?

“无明”就是糊涂。但糊涂分两种。一种叫顽固不化,朽木难雕,不可教也,“无明”应该是指这一种。另一种,比如少小无知,或“山重水复疑无路”,这不能算“无明”,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奏,是成长壮大的起点。而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已然是大智慧了。

后一种糊涂,是错误吗?执着地想弄明白某些尚且糊涂着的事物,不应该吗?比如一件尚未理清的案件,一处尚未探明的矿藏,一项尚未完善的技术、对策或理论。这正是坚持不懈者施才展志的时候呀,怎倒要知难而退者来劝导他呢?严格地说,我们的每一步其实都在不完善中,都在不甚明了中,甚至是巨大的迷茫之中,因而每时每刻都可能走对了,也都可能走错了。问题是人没有预知一切的能力,那么,是应该就此放下呢,还是要坚持下去?设想,对此,佛祖会取何态度?干脆“把一切都放下”吗?那就要问了:他压根儿干吗要站出来讲经传道?他看得那么深、那么透,干吗不统统放下?他曾经糊涂,曾经烦恼,但他放得下王子之位却放不下生命的意义,所以才有

那锲而不舍的苦行，才有那菩提树下的冥思苦想。难道他就是为了让后人把一切都放下，没病没灾然后啥都无所谓？该想的佛都想了各位就甭想了，该受的佛都受了各位就甭再受了，该干的佛也都干了各位啥心也甭操了——有这事儿？恐怕，盼望这事儿的，倒是执迷不悟。

可是，哪能谁都有佛祖一样的智慧呢？我等凡人，弄不好一错再错，苦累终生，倒不如尘缘尽弃，早得自在吧。可是，怕错，就不是执着？怕苦，就不是执着？一生享用着别人执着的成果，却一心只图自在，不是执着？不是执着，是执迷！佛祖要是这般明哲保身，犯得上去那菩提树下饱经折磨吗？偷懒的人说一句“放下”多么轻松，又似多么明达，甚至还有一份额外的“光荣”——价值感，却不去想那菩提树下的所思所想，却不去辨别什么要放下、什么是不可以放下的，结果是弄一个价值虚无来骗自己，蒙大家。

老实说，我——此一姓史名铁生的有限之在，确是个贪心充沛的家伙，天底下的美名、美物、美事没有他没想（要）过的，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他多病的原因。不过，此一史铁生确曾因病得福。二十一岁那年，命运让这家伙不得不把那些充沛的东西——绝不敢说都放下了，只敢说——暂时都放一放。特别要强调的是，这“暂时都放一放”，绝非觉悟使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先哲有言：“愿意的，命运领着你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走”。我就是那“不愿意”而被“拖着走”的。被拖着走了二十几年，一日忽有所悟：那二十一岁的遭遇以及其后的二十几年的被拖，未必不是神恩——此一铁生并未经受多少选择之苦，便被放在了“不得不放一放”的地位，真是何等幸运的事情！虽则此一铁生生性愚顽，放一放又拿起来，拿起来又不得不再放一放，至今也不能了断尘根，也还是得了一些恩宠的。我把这感想说给某位朋友，那朋友忒善良，只说我是谦虚。我

谦虚？更有位智慧的朋友说我：他谦虚？他骨子里了不得！这“了不得”，估计也是“贪心充沛”的意思。前一位是爱我者，后一位是知我者。不过，从那时起，我有点儿被“领着走”的意思了？

如今已是年近花甲。也读了些书，也想了些事，由衷感到，尼采那一句“爱命运”真是对人生态度之最英明的指引。当然不是说仅仅爱好的命运，而是说对一切命运都要持爱的态度。爱，再一次表明与“喜欢”不同，谁能喜欢坏运气呢？但是你要爱它。就好比抓了一手坏牌，你骂它？恨它？耍耍赖重新发牌？当然你不喜欢它，但你要镇静，对它说是，而后看你如何能把这一手坏牌打得精彩。

大凡能人，都嫌弃宿命，反对宿命。可有谁是能力无限的人呢？那你就得承认局限。承认局限，大家都不反对，但那就是承认宿命呵。承认它并不等于放弃你的自由意志。浪漫点儿说就是：对舞蹈说是，然后自由地跳。这逻辑可以引申到一切领域。

所以，既得有所“放下”，又得有所“执着”——放下占有的欲望，执着于行走的努力。放不下前者的，必至贪、嗔、痴。连后者也放下的，难免还是贪、嗔、痴。看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人，怎么可能会爱命运。不爱命运，必是心里多有怨。怨，涉及到人即是嗔——他人不合我意，涉及到物即是痴——世界不可我心，仔细想来，都是一条贪根使然。

（选自《散文选刊》2009年第1期）

## 重峦叠嶂的田园

余秋雨

—

天下没有什么事比文化更复杂的了。

你看，我们要衡量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在文化上的高低，就远不如对比他们在军事上的输赢方便，因为他们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别，很难找到统一的数字化标准。但是，如果与后来那批沉溺于清谈、喝酒、吃药、打铁的“魏晋名士”比，他们两个人的共性反倒显现出来了。不妨设想一下，他们如果多活一些年月听到了那些名士们的清谈，一定完全听不懂，宁肯回过头来对着昔日疆场的对手眨眨眼，耸耸肩。这种情景就像当代两位年迈的军人，不管曾经举着不同的旗帜对抗了多少年，今天一脚陷入孙儿们的摇滚乐天地，才发现真正的知音还是老哥儿俩。

然而，如果再放宽视野，引出另一个异类，那么就会发现，连曹操、诸葛亮与魏晋名士之间也有共同之处了。例如，他们都名重一时，他们都意气高扬，他们都喜欢扎堆……而我们要引出的异类正相反，鄙弃功名，追求无为，固守孤独。

他，就是陶渊明。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这样的重峦叠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这三重文化人格，层层推进，逐一替代，构成了那个时期文化演进的深层原因。

其实，这种划分也进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为几乎每一个文化转型期都会出现这几种人格类型。

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因此，深刻意义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体人格史。

## 二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样。

正是这种不一样，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素质。

一般说来，在我们中国，最容易被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这种文化人格，以金戈铁马为背景，以政治名义为号召，以万民观瞻为前提，以惊险故事为外型，总是特别具有可讲述性和可鼓动性。正因为这样，这种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众的口味所改造，而民众的口味又总是偏向于夸张化和漫画化的。例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人物，刘、关、张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道义色彩而接近于圣，曹操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邪恶成分而接近于魔，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智谋成分而接近于仙（鲁迅说“近于妖”），然后变成一种易读易识的人格图谱，传之后世。

有趣的是，民众的口味一旦形成就相当顽固。这种乱世群

雄的漫画化人格图谱会长久延续,即便在群雄退场之后,仍然对其他人格类型保持着强大的排他性。中国每次社会转型,总是很难带动集体文化人格的相应推进,便与此有关。

中国民众最感到陌生的,是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魏晋名士对于三国群雄,是一种反叛性的脱离。这种脱离,并不是敌对。敌对看似势不两立,其实大多发生在同一个“语法系统”之内,就像同一盘棋中的黑白两方。魏晋名士则完全离开了棋盘,他们虽然离三国故事的时间很近,但对那里的血火情仇已经毫无兴趣。开始,他们是迫于当时司马氏残酷的专制极权采取“佯谬”的方式来自保,但是这种“佯谬”一旦开始就进入了的逻辑。不再去问社会功利,不再去问世俗目光,不再去问礼教规范,不再去问文坛褒贬。如此几度不问,等于是几度隔离,他们在宁静和孤独中发现了独立精神活动的快感。

从此开始,他们在玄谈和奇行中,连向民众做解释的过程也舍弃了。只求幽虚飘逸,不怕惊世骇俗,沉浮于一种自享自足的游戏状态。这种思维方式,很像二十世纪德国布莱希特提倡的“间离效果”,或曰“陌生化效果”。在布莱希特看来,人们对社会事态和世俗心态的过度关注,是深思的障碍,哲学的坟墓。因此,必须追求故意的间离、阻断和陌生化。

我发觉即使是今天的文化学术界,对于魏晋名士的评价也往往包含着很大的误解。例如,肯定他们的,大多着眼于他们“对严酷社会环境的侧面反抗”,其实,他们注重的是精神主体,对社会环境真的不太在意,更不会用权谋思维来选择正面反抗还是侧面反抗。否定他们的,总是说他们“清谈误国”。其实,精神文化领域的最高标准永远不应该是实用主义,这些文人的谈论虽然无助于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却把中国文化的形而上部位打通了,就像打通了仙窟云路。一种大文化,不能

永远匍匐在“立竿见影”的泥土上。

以魏晋名士为代表的游戏反叛型文化人格，直到今天还常常能够见到现代化身。每当文化观念严重滞后的历史时刻，一些人出现了，他们绝不和种种陈旧观念辩论，也不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或反抗者的形象，而只是在社会一角专注地做着自己的事，唱着奇奇怪怪的歌，写着奇奇怪怪的诗，穿着奇奇怪怪的服装，说着奇奇怪怪的话，他们既不正统，也不流行。当流行的风潮撷取他们的局部创造而风靡世间的时候，他们又走向了孤独的小路。随着年岁的增长，家庭的建立，他们迟早会告别这种生态，但他们一定不会后悔，因为正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岁月，使他们成了文化转型的里程碑！

当然这里也会滋生某种虚假。一些既没有反叛精神又没有游戏意识的平庸文人常常会用一些故作艰深的空谈，来冒充魏晋名士的后裔，或换称现代主义的精英，而且队伍正日见扩大。要识破这些人并不难，因为什么都可以伪造，却很难伪造人格：魏晋名士再奇特，他们的文化人格还是强大而响亮的。

### 三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这就需要多说几句了。

现在有不少历史学家把陶渊明也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争斗权谋的无果和无聊看得很透，这一点与魏晋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他会觉



得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他还会觉得,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都邑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恹恹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做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照理,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哄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哄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

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